

10/102

6118

V

第1-3期

(1989年)

续2



第一期

政协大连市中山区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旧社会人间活地狱——“红房子”

黄 本 仁

解放前，日寇把寺儿沟“规划”为中国人居住区。在寺儿沟雨山下，有一片约百余栋的红砖房子被严密包围在高墙和铁丝网里。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日寇则美其名为“碧山庄”。这是日本垄断资本家相生由太郎为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和经济掠夺建立的。“满铁”接管后，改名为“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华工收容所”。所内收容山东、河北、上海等地被骗来的中国工人，总数达三万六千多人。

“红房子”的概貌

一九一〇年前后，大连地区的建筑物一般都用灰白包或石料之外涂以水泥，或红砖与水泥相结合。而这个华工收容所完全用红砖。“红房子”由此得名。

“红房子”从一九一一年开始动工，除工人宿舍外，有供应工人生活日用品的“三合盛卖店”（归属满铁管理后，改名调度系），并有澡堂、理发店、医院等。

“红房子”总面积为十五万三千五百平方米，建筑物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尔后又增加到四万八千平方米，满铁接管后一再扩建，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五万余平方米。它的西、北两侧都用红砖磊地之高墙，东边用铁丝网代墙。正北是大门，门口西边设办公处，工人上下班必须通过此门，门口东西两侧设布小便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后堵死。在“红房子”周围，有赌场、妓院、六烟馆、当铺、小饭馆、小摊贩等。北大门的对面是日寇警察署的派出所，在东铁丝网栅栏外面是工头住宅，西墙外南北向是一道小沟，沟西是警署中国人刑事、巡捕之住宅，在刑事住宅处向北走不远的地方，是控制“红房子”工人由东往西去必经之处的咽喉要地。原寺儿沟火车站就设在这里。

“红房子”大院内，东西向朝南横列着一排排的楼房，中间还夹杂着为数不多的平房，有一百余栋。在正南当中有一地势很高的台基，上面建有一个庙宇，名为“天德寺”，庙内供奉天后娘娘等神像。在天德寺的东南面还有一个高塔，塔基高六点五尺，塔高二十一尺。此塔一九三九年落成，由日本国内一名所谓“高僧”题写名为“万灵塔”。塔的背面由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浪人金子雪斋撰文，说明此塔是为祭祀福昌公司所遭中日员工和“红房子”工人的亡灵。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红房子”红房子和生田太郎在塔前举行所谓悼灵大会，猫哭耗子似地演

“祭文”，以示“隆重”，意图以此塔来麻痹受压迫的广大工人。并斥“工人们死有所归”的谬论束缚工人的思想，妄图达到工人为他们卖命的目的。

在天德寺的东南还有座戏台。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八月十五日在这里演京、评剧五天。在天德寺西南隅有一栋平房，为工头们集会场所。

一九二五年日本内阁官内省以天皇名义对“红房子”统治者相生由太郎特赏赐巨款，以示鼓励他办社会事业“有功”，于是相生由太郎花六千余元在“红房子”正门上面建立一个大石碑，碑上按装大钟表，起名为“恩赐纪念時計塔”，不仅歌颂了天皇，也为他个人建立了“丰碑”。

座落在寺儿沟的“红房子”，就在这假亲善、假慈悲，真恐怖、真残杀的环境中，变相囚禁着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让他们为日寇卖命。

残酷控制“红房子”工人的工头相生由太郎

大连港的装卸工人即往船上装、卸货，又往车上装货，卸货。所以需要工人数量多，劳动量也重。为了管理好数以万计的装卸工人，大连港当局费了不少脑筋。一九〇七年十月一日主管大连港口事务之“满铁”理事田中佐次郎特聘相生由太郎任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毕业于日本商科大学，曾在日本三井集团经营之门司港做过煤炭装卸工的监督。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时，门司港煤炭装卸工为要求提高工资发动了大罢工，而相生由太郎运用分化、收买、拉拢、高压相结合之手段，使罢工在短期内就得以解决。接着，为直接控制工人，撤消原来大包工头制，改

为由相生由太郎直接控制的小工头制。这个改革给日本各港口装卸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影响很大，相生由太郎之名从此大扬。相生由太郎担任大连港埠头事务所所长之后，将门司港的经验用于大连港，撤销了各搬运厅和大包工头，装卸货业务直接由港方经营和管理，并建立了小工头制。每一个小工头管理工人不得超过五十人，而各小工头均由相生由太郎直接控制，实际上相生由太郎已成为“红房子”至高无上的大工头。

相生由太郎在大连港装卸货业务的管理方法，使过去各大公司在海港的搬运厅间的互争利益矛盾消失，各大包工头拥“工人”自重的情况也没有了，现在在相生由太郎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以相生由太郎为核心的工头管理网络，为他长期垄断大连港运输业务打下了基础，也给港口数万装卸工带来恶运。

相生由太郎经常下工人作业区和中国人“交朋友”，口蜜腹剑地详细询问工人生活情况，以及最低生活费用，从而以最少支出作为中国工人的工资。相生由太郎用这种残忍手段为满铁和自己挣钱。一九二五年相生由太郎辞去事务所长职务，在山县通（今中山区斯大林路）大连湾关东侧，成立了个人私营的“福昌公司”，把大连港内一切装卸业务及所有装卸工全归“福昌公司”承包。经过数年对工人的残酷盘剥，相生由太郎已成为腰缠万贯之大富豪，成为东北和大连商界有名人物。日本统治阶层誉之为“在满实业界中唯一之勋功者”。并推举为“劳工会议所”（日本商会组织）所长，任期长达十年之久。

建造“红房子”的目的与由来

大连港东西长达十余里，南北三余里，停船码头紧靠火车道与货物堆放之处，距离近则数十公尺，远则在百公尺以上，来回装卸都得人工扛抬。尤其在那颤动的吊高的桥板上作业，工人们要肩扛二百多斤重的货物，保持着重心和有节奏的步伐，既要跑得快，又要走得稳，还要慢慢地放在应放之处。这种熟练功夫在短时间内很难掌握，所以必须长期培养，并要保证年青人不因活重而不下。

大连港每年吞吐一千万吨以上的货物，繁重的劳动量和难度很大的劳动训练，使相生由太郎下决心把散居在全市的海港装卸工人集中及从山东、河北、上海等地骗来的几万名工，集中在一处，于是弄儿河“红房子”便出现了。红房子在一九一一年竣工后，相生由太郎让全港工人迁入。名义上是为了“人道主义”、“中日亲善”、“改善生活条件”、“安居乐业”，实际上是把工人圈养起来，达到盘剥和“管理”的目的。这就是相生由太郎建“红房子”的目的与由来。

“红房子”华工的悲惨生活

码头工人被集中到红房子后，活再累生活再苦都得干下去，除非死了拖出去。广大码头华工居住的红房子，当时被人们称作人间地狱。

由于相生由太郎实行了“工头制”，使工人受到层层压榨和盘剥。大、小工头在港内的办事处都挂有名字牌，哪个牌出了事，就找那个工头。相生由太郎宠信的小工头，一个人还可以挂两、三个牌，如果实在

忙不过来。工头下面还有二工头代替。而工人挣的每月工资要拿出百分之二十“孝敬”小工头，不得少交分文。一年之中除春节外，三百六十天无休息日。实际上港内业务也有淡季，工人的活亦可轻松一下，但相生由太郎为了盘剥工人，在大连湾东边开辟了填海移山工程，生产红砖、采掘建材、筑港工程，而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装卸工人中抽调。相生由太郎一面维持海港的正常装卸业务，一面又增加其他生产业务，额外收入当然都装到相生由太郎的口袋里，而工人工资却不增加，相反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了。特别是移山填海工程，工人们将土石方装到铁轨上的土车子中，然后自高而下推入海中。由于坡度大、速度快、分量重。一旦脱轨即车翻人亡（填海总面积为四十万平方公尺）。数年间，工人死亡累累，因伤致残者更多。因此，“红房子”内整天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和恐怖的情绪。

相生由太郎用榨取广大华工的血汗钱，把他的雾岛町（今中山区金城街）住宅装饰得富丽堂皇。每年十月一日福昌公司诞生日，相生由太郎必在家中招待他的众工头，以巩固他的统治。

相生由太郎垄断大连港装卸大权后，引起日本内部上层的权力之争。一九二六年相生由太郎患了半身不遂之症，没有精力再统治红房子。于是以一百八十万日元把海港装卸大权和红房子全部卖给了“满铁”，把红房子改名为“福昌华工株式会社”。

“红房子”归于“满铁”后，由秋田印八负责统治。秋田的统治较

之而生是有进之无不及。广大华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每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特别是日寇狂侵略战争中节节败退之后。码头的军运任务繁重。广大华工劳动强度的加重和配给的食物定量不足。以及居住条件恶劣。冬天以麻袋片披身御寒。酷暑时节居住人多似蒸笼的情况下。使病号增多。而秋田却强迫病号上工。使“红房子”中华工死亡率直线上升。真是“直进横出”。敌伪警察和大、小工头在这里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肆意虐待华工。

“红房子”东边铁丝网外面有一条山岭。名叫“穷汉岭”。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沟渠地带。聚居着二千多户和“红房子”华工同样命运的一万多中国苦难同胞。他们是“闯关东”来谋生的居民。有的是小商小贩。有的是拆破烂渡日。临时搭上棚厦栖身。是旧社会有名的贫民窟之一。为敲诈这些穷苦贫民。汉奸走狗强行扒掉这些棚厦。另建新房高价出租。四、五十平方米地皮盖的“小马架”子竟然住上二、三十户人家。由于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这里无风三尺土。有雨全街泥。污水遍地。瘟疫流行。

在华工和寺儿沟一带居民中。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红房子”是杀人坑。日本工头赛虎狼。有进无出囚牢间。断气葬身乱尸岗。“红房子”实际上已成了旧社会的人间地狱。